

# 怎样读《汉书》

■汪桂海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主要记载了自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汉书》是继《史记》之后问世的又一部史学巨著,与《史记》齐名,并称“《史》《汉》”,又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在古代典籍中,《汉书》具有与经书同等的地位。

## 一、了解作者身世与成书经过

《汉书》之成,历经数人,其中最主要的作者是班固(32—92)。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出身于世代显贵之家,父班彪。班彪专心史学,认为《史记》记事止于太初年间,而之前众人所作续篇“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遂采集前代逸事轶闻,作《后传》数十篇,为《汉书》的编纂奠定了基础。《后传》原书已佚,其内容应多为《汉书》采纳,只不过后人已经无法辨认出来,今《汉书》元帝纪、成帝纪、韦贤传、翟方进传、元后传的“赞”是少数可以确认来自班彪《后传》的史论文字。建武三十年(54),班彪去世,班固秉承父志,在《后传》的基础上编撰《汉书》。不久,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说班固私改国史,诏令右扶风抓捕班固入狱。弟班超担心他被刑讯,不能申明情由,冤死狱中,遂赶赴洛阳上书,申诉班固著述《汉书》的真实用意,此时,《汉书》已经完成的篇卷亦被官府自家中取走并上呈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欣赏班固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职兰台令史,后迁为郎,典校秘书。自任兰台令史始,班固参与《东观汉记》的编纂,先是与人合撰《世祖本纪》,后又撰写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永平年间,明帝令班固继续《汉书》的撰写。建初四年(79),汉章帝于洛阳

北宫白虎观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异同,由章帝亲自裁断,命班固将讨论结果纂辑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该书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对《汉书》的思想影响很深。汉和帝永元四年(92),外戚窦宪败亡,班固受牵连入狱,死于洛阳狱中。其时,《汉书》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未完成。汉和帝令班固之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续写。班昭续成八表,《天文志》则由马续完成。《汉书》经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之手,前后历时三四十一年,足见著书之不易。

## 二、了解《汉书》的体例与基本内容

在现存的史籍中,《汉书》保存西汉历史资料最为完备。《汉书》体例严整,叙事详明。纪撮记大事,钩玄提要;表谱列人物,补传所不及;志述典章,明体制之变迁;传详人事,阐史实之原委。纪传表志功能各异,互为补充。

《汉书》包括纪十二篇,以编年体记载西汉十二位帝王(含吕后)在位时期的大事,为全书之纲领,对西汉兴衰的全过程作了基本勾勒。

表八篇,前六篇分别记录西汉时期异姓、同姓、外戚、功臣等各类王侯的功绩、封邑和世系。《百官公卿表》记载秦汉时期公卿将相等职官的设置变迁、职掌、级别,以及属官的员额、职能等,并以表格形式,按照十四级三十五官格,详细谱列西汉公卿将相等朝廷重要官员的任免迁转,皆系以年月,是研究秦汉官制的重要资料。末篇《古今人表》则收录汉以前的历史人物,从传说中的太昊帝到秦末吴广,依其品行、事功等分为九个等次,以示

褒贬评价。表的优点是补充了纪和传受体裁所限而无法记录的很多重要史实。

志十篇,专述古代至西汉的礼乐、刑法、天文、历法、灾异、经济、地理、水利、典籍学术等。《汉书》志有六篇与《史记》八书有渊源,但与《史记》多有不同,内容更为丰富。至于《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四篇则为《汉书》首创。《刑法志》系统地记载了古代至西汉法律制度的沿革,又兼述了古今兵制。《五行志》专载五行灾异,既是研究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直接材料,里面的水旱、雷电、地震等自然灾害和日月食等天文异常现象的记录又是研究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地理志》记录了西汉的郡国县道等行政区划、历史沿革、户口数字以及各地物产、风俗等,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必备资料。《艺文志》根据刘向、刘歆父子整理西汉宫廷藏书的成果《七略》,著录西汉宫廷藏书,总结诸子百家学术派别和源流,确立了中国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汉书》的志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每篇志都可以说是一部典章制度通史。欲了解上古至西汉的有关制度,《汉书》志是不能不读的。

传七十篇,包括人物传和中原之外诸民族传,分别记载西汉各领域重要人物的生平以及周边民族的历史等。一些历史大事在帝纪中因体例所限,寥寥数语,传则可以作详细记载。《汉书》人物传又有类传,如《儒林》《循吏》《酷吏》《货殖》《游侠》《佞幸》《外戚》等传;有数个生平遭遇、事迹等相似的历史人物的合传,如《陈胜项籍传》《韩彭英卢吴传》《卫青霍去病传》等;有世代为高官的家族传记,如《楚元王传》《张汤传》《杜周传》《萧望之传》《冯奉世传》等分别为张汤、

杜周、萧望之、冯奉世等人及其子孙的传记;有思想文化方面重要历史人物的单传,如《贾谊传》《董仲舒传》《司马相如传》《扬雄传》;另有一些参与重大历史事件的次要人物不足以立专传,也不足以与人合传,其简短的传记以附传的形式附于其他人物传末,如《卫青霍去病传》末的李息、公孙敖等传。人物传的编排皆以时代先后为序,类传在专传、合传之后,次则诸民族传,再次则外戚、元后、王莽传,最末为《叙传》。《叙传》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

《汉书》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文风谨严,对各阶层人物的描写于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汉书》保存了不少乐府歌辞、书疏文赋,例如《礼乐志》收入《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司马相如传》收入《子虚赋》《大人赋》,《司马迁传》收入《报任少卿书》,《东方朔传》收入《答客难》《非有先生之论》,《杨惲传》收入《答孙会宗书》,《扬雄传》收入《反离骚》《校猎赋》《长杨赋》等等,都是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

《汉书》原共计百篇,今本一百二十卷,缘于后人析分了其中的部分篇卷。

## 三、了解《汉书》与《史记》的关系

首先,《汉书》是断代史,《史记》是通史,这是二者的一个突出差异。班固之所以采用断代史的编纂方式,缘于他认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应该如唐虞三代,有典谟之篇扬名后世,冠绝百王。他批评《史记》把汉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坚信“大汉当可独立一史”,因此,班固摒弃众人认为《史

记》作续篇之旧轨,开辟断代为史之新途。他的这一创举对后世影响极大,正如刘知几所说“自尔迄今,无改斯道”。《汉书》之名亦仿自《尚书》,意在表明汉朝所创立之功业与唐虞三代齐等。为了贯彻“宣汉”思想,班固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降格为传,将原本为一个独立朝代的新莽朝的历史,亦以《王莽传》的形式附在西汉全部传记的后面。一言以蔽之,班固编撰《汉书》的主旨是颂扬汉朝,这是读《汉书》时应该注意的。

其次,纪传体史书创始于司马迁《史记》,《汉书》继承了这一编纂体裁而略有调整,将《史记》之“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功臣世家一律编入传。经过班固改动之后的纪传体,成为后世正史之范式。

再次,《汉书》记载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史事,与《史记》多有重叠。同一个人物的纪传,因为司马迁在史料采择和文字叙述等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没有必要故意另起炉灶,所以《汉书》常常移用《史记》的文字,这反映了班固实事求是的史学编纂思想。后人或有讥班固剽窃史迁者,所论未免偏激,班固以《后传》为基础,博采典籍、档案,斟酌去取,缀集成篇。

《汉书》一问世,即广为流布,“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后人更是赞誉《汉书》“文瞻而事详”,序事“不激诡,不抑抗,瞻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者之者蠢蠢而不厌”。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评论。

## 四、推荐《汉书》的几种读本

### 1.旧注本

《汉书》多用古字古训,文字艰深难懂。历代注释者很多,较具代表性的注本有二,唐颜师古《汉书注》和清末王先谦《汉书补注》,是集大成之作。前者以中华书局点校本最为通行,后者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点校本最便于使用。

### 2.今注今译本

古人的注释对今天的读者而言同样存在理解上的困难,因此,今注今译是不错的选择。张烈主编《汉书注译》(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吴荣曾主编《新译汉书》(台北:三民书局2013年)都是注解准确明晰,译文切合本义的注译本。

### 3.选注本

《汉书》篇幅很大,很多人可能做不到通读全书,可以选择好的选注本。这方面的选本也有不少,推荐三种。一是再昭德、陈直主编《汉书选》(该书选中华书局出版“中国史学名著选”丛书中的一种,1962年初版,之后多次重印);二是顾廷龙、王煦华《汉书选》(中华书局1962年);三是汪受宽《汉书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4.白文简体字本

有注文的本子,读起来不连贯。有的读者不喜欢正文中间有大量注文,追求阅读连贯、方便,可以选择白文本。中华书局、岳麓书社等都出版过用简体字排版的《汉书》,删去了颜师古注和缺乏可读性的八表的表格部分。

## 看法

## 《三字经》可以编注,无需删改

流传甚广的国学经典《三字经》近日有了一个新版本,即年已九旬的著名作家宗璞和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李存山合作编注的《三字经节简注本》。和以往各版本有所不同的是,因不认同《三字经》中有关“三纲”“君臣”的内容,宗璞大胆对其进行了一些删改,认为这是“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举。(7月31日《北京青年报》)

由于历史治理理念及作者思维局限等因素,《三字经》中的“三纲”“君臣”等内容,更适用于当时,与现代政治、思想肯定有出入。《三字经》中有关“三纲”“君臣”等内容,很多人都不喜欢也不认同,不喜欢不认同就是“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三字经》编注者,有权表达自己的思想,有义务对《三字经》中的糟粕内容提出反对意见,但没有必要直接删改《三字经》,使原版《三字经》变得面目全非,甚至不伦不类。

作为古代文化的经典,《三字经》中提到的“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是反映历史,也是传承历史。即不管我们认不认同,君王与臣子的言行要合乎义理,父母子女之间要相亲相爱,夫妻之间要和和顺顺相处,在那个时代,都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也有一定的情理根源。

《三字经节简注本》将原文中的“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改为“三求者,真善美,多思考,常在心”,将“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改为“为祖国,为人民,求真,多行善,创造美,度一生”,既扭曲了《三字经》作者的思想,掩盖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真相,也大大削弱了原版《三字经》中的历史性、思想性元素。即使从文学艺术性上看,经过改编的内容,也没有《三字经》原文更通俗,没有《三字经》原文朗朗上口。

阅读古代经典时,每个时代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认知,面临着如何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不是动摇原作的思想脉络和情绪基础,也不是对古代经典内容主动“刀子”,将不适合现代的内容直接删除,将不符合当代思想的修改成想要的样子。我国的古代经典数不胜数,如果都按照现代人的思想,将所有古代经典删改一次,有多少人会同意呢?《水浒传》中的人物宋江也曾屡遭争议,我们是不是也要对这个人进行美化,删除其“糟粕”思想?

对历史经典译注、增补,是业内的常态性工作。这有助于人们理解、阅读,也有助于人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编篡出版古代经典节简注本,可以有作者的个人情感喜好,提供对历史经典挖掘、研究的成果,这是区别不同注本的需要。但对古代经典改头换面,删改古代经典中的精神糟粕、艺术瑕疵,却是很粗鲁的。其结果,很容易无意中伤害经典,损毁经典的历史价值、思想价值、文化魅力,不利于这些经典的传播、吸收和批判。如果觉得《三字经》的形式很好,可以编著《新三字经》,而不是在原版基础上删改。

江苏省扬州市 卞广春

## 删改《三字经》不如批判性解读

流传甚广的国学经典《三字经》近日有了一个新版本,即年已九旬的著名作家宗璞和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李存山合作编注的《三字经节简注本》。和以往各版本有所不同的是,因不认同《三字经》中有关“三纲”“君臣”的内容,宗璞大胆对其进行了一些删改,认为这是“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举。(7月31日《北京青年报》)

对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国人早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共识,但何为“精华”,何为“糟粕”,人们又该如何做到科学“取舍”,却不见仁见智的争议与解读。比如有人主张正视历史沿革,对国学经典中的所谓“糟粕”,施以批判性地解读与传承,也有人力主以外科手术方式剔除“糟粕”,亦或是以诠释现代理念的词汇取而代之。宗

璞对《三字经》中“纲常”内容删改,就是后者的典型案例。

历史是讲究褒贬与沿革的。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也需要正视历史现实,尊重并理解其文化渊源与思维局限,切忌以当代理念强加于古人的霸王硬上弓。《三字经》作为流传甚广的国学经典,不仅早已成为中国妇孺皆知的启蒙读物,还传播至我韩国和日本,近代更被译作英、法、俄等多种文字,甚至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教育丛书”向全世界发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字经》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身为原产地的国人,我们有责任维护《三字经》的原始性、规范性与严肃性,岂能随心所欲的任由删改?

缘自封建礼教的“纲常”伦理,的确不乏等级森严和刻板意味的不合理不平等之处,但具体到《三字经》,却并无“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单方强势之意,而是为其定下了“君王与臣子的言行要合乎义理,父母子女之间相亲相爱,夫妻之间和顺相处”的行为准则。正如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姚小鸥所质疑的,《三字经》中“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几句是有来历的,并非哪位思想家心血来潮杜撰出来,也不是哪位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社会组织形式的理论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讲究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儒门“纲常”思想的本质也是要强调双方互有责任,即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只是后来被统治者利用和歪曲,“三纲”中的所谓“糟粕”,其实就是毫无原则和不辨是非的“愚忠”“愚孝”和“夫权”。而这种不合理的愚昧性教化,并非只存在于宗璞所修改的寥寥数句,而是或轻或重地弥漫于整部作品,要“改”除非另起炉灶。而面目全非的修改则无疑有负“国学经典”名号,只能称之为“新编三字经”。

精华与糟粕并存是包括《弟子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在内国学经典的共性,让孩子们适当接触些所谓“糟粕”,或有助于其了解传统文化来龙去脉,提升其对于历史文化的价值判断力。阅读国学经典,关键在于批判性的解读与引导,而非硬性割去“糟粕”地“洁污癖”。

河南省漯河市 张玉胜

## 古代经典“去糟粕”不宜改内容

流传甚广的国学经典《三字经》近日有了一个新版本,即年已九旬的著名作家宗璞和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李存山合作编注的《三字经节简注本》。和以往各版本有所不同的是,因不认同《三字经》中有关“三纲”“君臣”的内容,宗璞大胆对其进行了一些删改,认为这是“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举。(7月31日《北京青年报》)

《三字经》删“纲常”内容,恐怕是多此一举。从报道来看,《三字经节简注本》将原文中的“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改为了“三求者,真善美,多思考,常在心”;将“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改为了“为祖国,为人民,求真,多行善,创造美,度一生”,等等。仅从文学性上说,改编的这两句就有所不知。虽然《三字经》原本就通俗而朗朗上口,但总体来说还是文约义的,而改编的这两句,显然有失文约义的感觉。

最关键的是,《三字经》本是古代经典,它所提到的“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大致是主张君王与臣子的言行要合乎义理,父母子女之间要相亲相爱,夫妻之间要和顺相处。这是古代人与人之间应遵守的三个行为准则。虽然我们废除帝制已经100余年,皇帝早已不存在,不必再讲“君臣义”,但“父子亲”与“夫妇顺”,还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不能随着“君臣义”一起删掉,删除之,难道要父子不亲、夫妇不顺?即使保留“君臣义”又如何?“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是对封建社会人际关系的理论总结,现在的人们在用它来对孩子进行传统文化熏陶时,有必要让孩子认识到特定历史阶段人际关系的全貌,而不是一鳞半爪。

对于“三纲”应该如何看,近年来屡有争议。按照传统理解,“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要求为君、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也有观点认为,“纲”是准则、规范、表率之意,现在有不少学者认为,“君为臣纲”意为当君主

的为臣子作好表率,“父为子纲”意为当父母的要为子女作好表率,“夫为妻纲”意为当丈夫的要为妻子作好表率。可见,“三纲”并非约束臣、子、妻的,而是约束君、父、夫的。从该角度说,此“三纲”未必就是糟粕,未必会腐蚀孩子心灵。

对传统文化确实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不应是在编篡出版那些古代经典之时。囿于历史原因,一些古代经典读物难免含有一定的精神糟粕、艺术瑕疵,但它们能被历代中国人奉为经典且不断流传,证明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仍然为世人所公认,还是不宜轻易改头换面为好。“去糟粕”应该放在我们用那些经典读物教育孩子之时,不简单地进行灌输,不简单地要求孩子囫圇吞枣地背诵经典,而是“探究式”学习,有所批判,有所扬弃。比如“君为臣纲”,其实就可以让孩子们理解为领导要为工作人员作好表率,“上致君,下泽民”就可以让孩子们理解为“上可以报效祖国,下可以为人民谋福利”。

成都市武侯区 何勇海

## 期待城乡多建立一些“阅读岛”

据7月31日《人民日报》报道,银川市图书馆近日正式开放首批设立在火车站、市民大厅、医院、银行等10个全市大型公共服务场所内的城市阅读岛。阅读岛的图书主要由银川市图书馆定期配送,共计20余种期刊、10种报纸、300—600册图书,市民可免费阅览。阅读岛还专门配备了电子书下载机,市民可以用手机下载,随时阅读。

欣闻银川市有了城市“阅读岛”,它是图书馆与其他相关民生单位为群众兴办的文化实事,方便了群众阅读图书,有力地推进了地方全民阅读工作蓬勃开展。这一做法,值得点赞。城市图书馆是服务市民阅读工作开展的主要事业,也是中坚力量,它图书资源多,且拓展服务方式有潜力可挖。城市火车站、市民大厅、医院、银行等大型公共服务场所是人员密集聚集

场所,他们为市民提高阅读服务,同样有着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假如图书馆能够敢于改进服务方式,积极拓宽服务思路,更好地履行职责,开展“走出去”服务,加强与这些大型公共服务场所实施联系“对接”,达成公益性服务“协议”,在服务大厅内开设城市“阅读岛”,定期更换配送图书和报刊,以便满足市民和群众阅读图书的需求,不仅能够增加这些民生服务单位的文化“品位”,重塑单位社会形象,而且能够吸引群众前来办事的“人气”,让他们合理利用等候办事的时间来读书,享受阅读带来的“愉悦”。如此,方便了他们阅读图书,进而滋润他们们的“心田”,扩大的是文化公益事业服务的“含金量”,社会效益不言而喻。

总之,城市“阅读岛”的悄然应运而生,是推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新生事物。她的出现,让我们看到好!城市“阅读岛”,让人们看到图书馆与这些相关民生服务单位共同做好这样的便民服务 works,其社会价值多多益善,有利于推进群众养成热爱读书的习惯,增进提升群众文化素质和社会进步。

时代社会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书香社会也必须要加快建设。在推进全民阅读的进程中,只要群众想到了,我们的相关单位就要努力去做;只要能够方便群众阅读的,我们的相关单位就更要努力去做。群众有所需,我们就要有所应,何愁不能做好推进全民阅读工作呢?!因此,只要相关单位肯动脑肯努力,全民阅读工作一定会开展得丰富多彩。

现在城市有了城市“阅读岛”,那么在我们的农村呢?我以为,自然而然也需要农村集镇“阅读岛”。相关单位联手建立城乡“阅读岛”,值得尝试。当然,我们的地方政府也要鼓励,并且在财力上予以保障。期盼各地城乡图书馆,都能够像银川市图书馆那样,为了群众阅读事业的大发展,创新服务方式,加大服务力度,通过积极“走出去”,与大型公共服务场所沟通“对接”,多建立一些让市民和外来群众欢迎的、并且能够随时阅读图书的“阅读岛”,我们拭目以待!

江苏省东台市 朱霞